

# 唐朝选官制度对胥吏阶层的影响

□ 厦门大学历史系 董维维

**摘要** 科举选官制度一方面提供了胥吏阶层产生和繁荣的条件,客观上促使胥吏政治权力的扩大;另一方面科举选官限制胥吏参与的政策,使得官、吏分途,断绝了胥吏企图通过恪尽职守、努力工作跻身仕途的念头,从而限制了胥吏的升迁。

**关键词** 科举制度 胥吏阶层

中图分类号 G271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4-11-5

胥吏是介于官、民之间,为“官、民交接之枢纽”(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五)。所谓“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五《选举考八·吏道》)。胥吏职位虽然不高,但他们为“民之所悬命”,是与百姓生死、利益息息相关的人物,他们是政府最基层的工作人员,为各级官署行政收集整理信息,沟通官民之间的关系。胥吏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存在于中央地方各级官府内,是统治阶级机制运转的实际操作者,掌握着实权。

## 一、胥吏何为?

“胥吏”这一词语,出现在韦庆远先生的《中国官制史》一书中,其中给予的解释很充分:“胥,指的是供官府驱使的劳役,负责催征赋税、维持治安、把守关卡、看守仓库、看管和押解犯人、押解官府物品的杂事,吏是在官府承办具体公务的人员,虽然也有役的性质,但毕竟不同于胥,其地位略高于胥,他们在官府负责文书事务,承办具体事务,如收发公文、保管档案、誊录文书、造报账册、处理各种文书等文案事务。”<sup>[1]358</sup> 简言之,胥吏就是“在官府中专门经办各类文书的人员、处理具体事务和技术性工作人员和从事其他杂务厮役的人员”<sup>[1]358</sup>。古代各封建王朝胥吏职责虽有变化,但大体来说基本相同,明代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胥吏》中把汉代以后的吏,全称为“胥吏”或者“吏胥”,后人基本沿袭这一称谓。

隋唐以后,采用科举制来选拔人才,科举选拔出数量更为庞大的官员在官僚机构中担任各部门和各地区的要职,负责一个地区的司法、行政、税务等的决策权,是政府监管的主要力量,而科举选官选拔的大量文人使得胥吏这个阶层受到了影响,本文在接下来的部分主要阐述三个方面的影响。

## 二、科举重文使吏权阶层壮大

封建王朝的科举选官制度主要以明经和进士二科为主。其中,明经可以分为“帖经”和“墨义”两类,其主要目的在于测试考生对于经典诗词的熟练程度,根据实际情况又增加了考察“时务策”内容,其目的是考察学生的政治思维,进士在唐朝初期主要测试“时务策”,后来增加了杂文和帖经两个项目。对考生进行杂文的考察,初始阶段只考察文体,后来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开始考察作诗和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科举选官着重于考察读书人对经义的记忆和理解、对时局的看法和见解。这种考试内容使得应试者能够精通书本知识,但是他们缺乏实用性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使得不同类型人才的权力分配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例如,在史书中有下列几句记载:“胥吏所习,钱谷簿书,乃当世之务”,“胥吏之人,少而习法律”。官与吏所习内容的不同,也就导致了在狱讼、钱谷等有关法例的熟悉上,科举选出来的官与胥吏存在差异。正如赵匡在《选举议》中就有所提及:“士人读书,诵疏文,不习政务”,“及临人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甚至唐高祖宰相,处理政

务时都要依靠胥吏,如唐代宗时,曾出任宰相的元载,史书上就说他凡事“外委胥吏”。

胥吏不仅掌握法例等实用性知识,在任期方面,胥吏和官员也有着差异,使得胥吏阶层的权力不断扩大。历史上,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其核心意思是官职是不能够世袭或者传给亲属的,而胥吏虽然也不能世袭,但其能够通过各种手段使其职位成为自家的封建领地,实际上这一职位得以长期保留。历史上,为了防止“官有封建”,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常常对官员实施任期制,规定官员的任期,意在防止一位官员在同一地方任年限太长,形成巨大的权力圈。有的统治者还实施回避制,规定官员不得在自己家乡任职,也不能使得有血缘关系的人在同一州县甚至同一部分工作,避免出现拉帮结派现象的出现,有效地控制了腐败的蔓延。但是,官员任职时间的缩短使得他们与百姓之间的关系疏远,影响了政策的延续性和有效性。

当然,为了限制胥吏,也有一些相应的政策,规定胥吏任期为五年,只是这个规定收效甚微,胥吏与官员不同,他们可以改头换面,让自己的亲属继续担任这个职位,经过亲属之间的传递,使得胥吏这个职位一直在一个家族中存在,而胥吏就成为家族的“世业”。例如曾经在浙江某地的衙门当中有一个“通供”的职位,雍正元年御史汪继燮在上奏给朝廷的奏折中称,“父以传子,兄以传弟,钱粮出入,尽归掌握”。胥吏在衙门“子弟亲戚,转相承授”,“每有父子姻亲,盘踞年久者”,<sup>[2]275</sup>通过这一途径逐渐形成了“吏有封建”的现象,胥吏阶层不断地将基层政府部门演变成自己家族的权力领地,大发其财。官员们不熟悉律例,不得不依赖熟悉事务的胥吏办事。这样就使得胥吏在与官员博弈中占据了上风,有些愚昧的官员甚至被胥吏牵着鼻子走,胥吏也就掌握了实权。

通过科举做官的士人,虽然在文辞方面有一定的特长,但是治理一方需要有法令、经济、文教等实用知识,这些正是他们所缺乏的。除此之外,他们在行政事务处理上缺乏经验,通常情况下这些事务都由胥吏来处理,这使得长期参与实际运作的胥吏获得权力的上升空间。宋朝时期甚至出现“诸州大狱,长吏不亲决,胥吏旁缘为奸,逮捕证佐,滋蔓逾年而狱未具”的局面。

## 三、科举选官限制胥吏升迁

科举选官最为重要的地方就是保证了“取士”的公平性。但是这种公平仅仅是相对而言的,作为重要群体的胥吏阶层却没有得到重视。例如,唐朝后期统治者决定不能让胥吏阶层参加进士科考试,阻碍了他们进一步升迁的道路,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

至今能够查阅到的资料显示,最早阻止胥吏参与科举考试的政策出现在唐宪宗时期,《全唐文》卷六一《宪宗》中有记载,宪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敕:“自今已后,州府所送进士,如迹涉疏狂、兼亏

# 清末天津警察裁判治安案件研究

□ 河北工程大学社科部 陈 静

**摘 要** 天津于1902年仿效西方创建了中国近代的新式警察,此后天津警察开始履行审理治安案件的职责,此举突破了中国传统的行政与司法一体的政体结构,推动了中国政治体制内的行政权与司法权、立法权的分离。

**关键词** 天津 警察 裁判 治安案件

中图分类号 G271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4-11-5

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实行行政、司法一体的政制模式,地方上大小案件的审理均属地方行政长官的职权范围。天津于1902年创建了中国近代的新式警察,该部门成立后即开始履行裁判治安案件的职责,此举突破了中国传统的行政与司法一体的政体结构,改变了中国以往的刑事、民事案件不分的现状,推动了中国政治体制内的行政权与司法权、立法权的分离。因此,对天津警察裁判治安案件的探讨可从一个侧面展现中国政体制度、社会治理模式及人们的法律观念等向现代化方向迈进的历史过程。

## 一、法律依据、审理程序

1902年前天津的各种案件均归天津地方行政长官审理,天津警察成立后,天津巡警总局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为天津警察行使审判治安案件的职权制订了配套的法律依据和审理程序。

1.法律依据。传统的中国,地方上各种大小案件皆由地方各级政府长官(县令、知府等)判决,“根本不存在司法与行政分离的观念”,审理各种案件“几乎成了各级地方行政长官在所有职务活动

中占用最大比重的内容”<sup>[127]</sup>。1902年天津新式警察制度创建后,治安案件转由警察负责审理与执行。天津警察此种职责的依据为《天津南段巡警总局现行章程》、《违警罪目》等法律法规文件。《天津南段巡警总局现行章程》明确规定“凡有妨害治安、违犯警章者,统由本局警察官办理,即警察应有之权”<sup>[128]</sup>。《违警罪目》规定了125条违警罪,主要内容为:“不遵守规则,贮藏火药及他项能炸裂之物与磷质物者,捏造谣言惑众尚未成事端者,……抛弃冰雪、尘芥等于路上者,逼良为娼尚无局奸图骗情事者等。”<sup>[129]</sup>

2.审理程序。分局审结的案件,没有严格的立案条件,一般分为到局禀控、巡警查获两种情况。总局发审处审理的均为较重的案件,其判案程序比较严格,分为立案、审讯及复核三个环节。发审处立案的条件有二,第一种系由各分局送总局的案件,第二种情况较复杂,先由诉状者到巡警总局门口呈递诉状,由守门巡警引至号房挂号,号房将原状送交审判课登记后转交检事长审核,检事长批准后方为立案。检事长核准后,即进入审讯环节,案件

礼教,或曾为官司科罚,或曾任州府小吏,有一事不合入清流者,虽薄有词艺,并不得申送入。”如早在武则天建立周政权之时,尽管为了扩大统治基础,拔擢人才很滥,但仍“降敕,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至中唐更进一步。唐德宗“敕,流外出身人今后勿授刺史、县令、录事参军”。即胥吏不得任地方长官、要职。到宋甚至规定:“凡吏职年满,依法不、补授侍郎。后有恩赏者,许循修职郎,用考地关升,至从政郎止”。也就是规定了胥吏出职后晋升,一般被控制在八品之内,即使胥吏有幸突破种种限制跻身官员之列,“吏”的身份又决定了他只能处于官僚集团的下层。

经过种种限制,胥吏仕宦前途就变得极为有限。这也就断绝了胥吏企图通过恪尽职守、努力工作跻身仕途的念头,限制了胥吏的升迁,使得胥吏缺乏自我激励、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处于官僚体系末端的胥吏,其政治地位卑微,且无升迁之望,经济上又仅有微薄的俸禄。因此,迫于生活压力,胥吏阶层的腐败越来越严重,不顾法律和当朝者的要求,利用职务的便利开始大肆贪污。

## 四、地位低下,良莠不齐

按《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而科举选制实行后,使得胥吏的命运与这种精神正好背道而驰。既可能随时遭笞杖,“毁伤”身体发肤,又遇到各种限制,一般说终生无“扬名于后世”之日。所以“胥吏”渐渐地为世人所不齿,甚至连平民都不肯为吏。随着社会日益发展,封建王朝统治事务变得越来越复杂,中央王权的控制越加严格,通过颁发更多的律令来加强管理,这样就使得胥吏的分工越来越细,人数也就越来越多,分工

变细,所从事的事务也更容易掌握,这样封建王朝对胥吏人选的政治、文化素质要求就没有之前那么严格。胥吏的选拔门槛不断降低,只要身家清白、字迹端正、文理通顺即可入吏,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胥吏的来源繁杂,素质低下。“汉以前吏胥士也,卿大夫多出焉,其人自爱而重犯法,以是吏胥贵。唐宋以来,士其业者,不为吏胥,为吏胥者,则市井奸猾巨家奴仆及犯罪之人,以是吏胥贱。”<sup>[130]</sup>明清时期要成为胥吏,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多高的文化知识。这一方面为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吏子孙以及地痞流氓们开启了方便之门,另一方面更是从制度上放纵了胥吏对于道德修养的提高,使得胥吏一职成为一个道德素质低下、良莠不齐的阶层。

综上所述,科举选官制对胥吏阶层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无形当中使得胥吏群体的权力得到不断的扩大;另一方面科举选官后官、吏分途,断绝了胥吏企图通过恪尽职守、努力工作跻身仕途的念头,限制了胥吏的升迁,使得胥吏缺乏自我激励、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此外,科举选官之后社会产生流品观念,胥吏的社会地位日渐卑下,士人以出任胥吏为耻,使得胥吏日渐成为一个道德素质低下、良莠不齐的阶层。通过对唐朝科举选官制度的分析会发现其对胥吏阶层的影响,其考试的内容重视文化知识而使胥吏阶层权力扩大。对胥吏参加考试的限制使这个阶层丧失向上的机会和信心。国家的发展使得科举选官不得不对胥吏素质要求变低而造成流入胥吏阶层的人变得鱼龙混杂。

参考文献

- [1]韦庆远.中国官制史[M].东方出版中心,2011.
  - [2]韩毓海.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M].九州出版社,2011.
  - [3]牟愿相.说吏胥[M].文海出版社,1987.
- ★作者董维维为厦门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